

“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

——路翎晚年创作的心理起点与认识之诗

郭冰鑫

摘要 在与七月派“潜在写作”的对照中，路翎在监狱—劳改生活中的精神失常和不读不写值得作为问题研究，以明确其晚年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殊为重要的精神构成。路翎晚年的诗行中既有广为学界讨论的未毁的“心脏”，也有一个怯弱战栗的言说主体需要直面。路翎写作重启时的心理认知接近其小说人物序列中的“弱草”，尤其是《卸煤台下》的人物许小东。以此为起点，路翎以“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为写诗的动力一种，产生强烈的认识动能，经历明亮的歌颂、克制的静观、深入的内面探索和对小我之“失败”的体认，以怯弱渺小而非精神扩张体验到生的奇迹和死的事实。经由晚年的认识之诗，路翎写下自己能否和能以何种方式嵌入中国伟大复杂的历史进程的思索，并在找到最终的落点后离开了诗歌写作。

关键词 路翎 晚年诗歌 潜在写作 七月派

作者郭冰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166-11

1981年3月，重获自由的路翎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初雪》写下后记，这篇字数不长的后记被认为是路翎“‘文学晚年’的起点”。^①以目前《路翎全集》收录的晚年作品观之，将《初雪》后记作为路翎晚年创作的起点应是确切的，但这个起点指向一个明确却常被讨论者略过的提示，即路翎晚年创作起始于两次平反以后，也就是说沉沉压在身心的“反革命”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路翎无法将自身经历的长达二十六年的生命内容诉诸文学。

这本是常理。对一个因文学主张及实践两度入狱服刑，又两度入院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犯人来说，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冒风险进行任何潜在或显见的写作。但对一个在政治厄难前后均创作了大量作品，以文学为重要且主要生命内容的写作劳动者来说，路翎长达二十六年的“不写”是研究者不易消化的事实。尤其在同样经历胡风反革命冤案的难友“潜在写作”的对照下，路翎的“不写”若不作为问题得到研究和解释，恐难进一步明确其晚年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殊为重要的精神构成。本文由此进入，找寻路翎晚年创作的心理起点，该起点联系的可能是路翎在早年作品中就已经显示出的于强者和弱者的对位中复杂的双向体认。以此为观照，路翎创作于1981—1990年的晚年诗歌文本^②将得到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不同的阐释。这些新时期创作的诗歌不只是路翎未毁的明证，也是他对“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③这一总问题的认识之诗，它们很有可能是路翎沿着内在之道路，在其历史担负被外力卸除后展露出的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己所熟悉的一个应然的趋向。

① 张业松：《路翎陈述——写在〈路翎晚年作品集〉前面的话》，《书屋》1997年第4期。

② 本文所考察的路翎晚年诗歌文本选自全新整理出版的《路翎全集》第10卷，该卷收录路翎1938—1990年的诗歌作品。1998年张业松、徐朗编辑的《路翎晚年作品集》收录路翎晚年诗歌94首，《全集》新增140首，晚年诗歌共计234首。

③ 路翎：《听一曲歌唱起来》，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69页。

一、“潜在写作”与“不写”

尽管有学者对路翎二十多年的政治厄难做过一些珍贵的采访和描述，但由于路翎晚年精神状况和对这段生活的相对缄默，材料始终比较有限。除少数几篇珍贵的追忆文章涉及监狱和劳改生活外，路翎及其家人没有留下类似梅志《胡风沉冤录》^①或《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②那样细致追叙受难者牢狱生活和心路变化的文字材料，路翎也没有像其他难友一样多少留下一些“潜在写作”文本，这都造成了对路翎晚年创作心境追索的难度。不过，材料的匮乏不代表无法面对有限的材料发问，也许借助发问与逐渐逼近问题核心的作答，能尝试寻找路翎晚年创作的心理起点样态。

陈思和、刘志荣等学者曾整理编辑七月派作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潜在写作”作品，并形成重要论述^③。对路翎研究者来说，面对这些相当震撼且不同于当时主流文学，经由“心写”“默吟”留下的作品，有一个问题亟待回应，即为何嗜写如命的路翎在遭难时竟未留下任何作品，甚至也极少读书、看报、记日记的记录。据李辉采写，在“文革”以前，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不少涉案人员都有机会阅读和写作，而涉及路翎的狱中生活，李辉写道：“路翎没有吟诗，没有学外文，他连书报也拒绝看……他什么也写不出，什么也不想写。”^④朱珩青也曾试着追问路翎：“胡风在狱中背诗、做诗，绿原在狱中学德语，进行着回答‘是要胡风还是要党’的思想斗争，您当时呢？”得到的是路翎简单的回答“关着呗”，余明英从旁补充道：“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⑤

除去大量交待材料和申诉书外，路翎并非什么都没有写。在被朱珩青认为加入“某些想象”^⑥的《监狱琐忆》中，路翎提到：“在西郊监狱里，一度曾要我写读报纸的学习笔记，我做了一些署骂的，攻击的言论……在监牢里，曾要我写尽量长的小说，表示改悔，我写了讽刺的，四万字，后来不知下落。”^⑦在被要求以改悔为目的进行思索和创作时，路翎以署骂和讽刺表示抗辩——这是路翎不写也不愿深思的一个原因，他不能接受完全不由己地运用文思和情思。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不能将路翎应激似的反应，和他持续的不可控的愤怒完全归向对不公的反抗，因为从路翎后面的人生来看，他身上携带的意识形态创伤和精神的变异是相当深刻、复杂和显著的。此处的重点是，一个像路翎这样用大量文学实践来书写并理解世界的人，为什么遭难时却拒斥任何“由心”的、潜在的文学活动呢？甚至也拒斥借用任何熟悉的文化建构来帮助自己实现认识，勉力维持内心秩序，以致精神走向崩毁呢？

据同在剧协从事剧本创作的友人杜高回忆，1954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出成果的一年，也是路翎遭受批评最“凶猛暴烈”的一年，“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⑧1955年6月被羁押隔离以后，这种紧张和痛苦全面爆发。1973年路翎以“反革命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从1955年算起），路翎接受了判决，看到了刑满释放的希望，不再抗议，进入了一种怯弱谋生的平静。这倒不是说路翎取消了身心与外界的对峙感觉，而是在反抗无效的情况下将对峙内化为无法消解的冤屈。

① 梅志：《胡风沉冤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② 李辉编著：《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③ 陈思和最早提出“潜在写作”概念，“指作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50年代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其他各种原因，使许多作家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写作的努力，在各种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渴望，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字，并开拓出一个丰富的潜在写作的空间”。参见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刘志荣在“潜在写作”研究领域有重要专著，参见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6年，陈思和主编、多位学者参编的《潜在写作文丛》10卷本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七月派相关作品有胡风著《怀春室诗文》、张中晓著《无梦楼全集》、彭燕郊著《野史无文》、阿垅著《垂柳巷文辑》、绿原等著《春泥里的白色花》。

④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⑤ 朱珩青：《归来吧，路翎》，张业松编：《路翎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⑥ 朱珩青：《小引》，路翎：《监狱琐忆》，《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

⑦ 路翎：《监狱琐忆》，《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

⑧ 李辉、杜高：《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书屋》2001年第4期。

冤屈感应该说是晚年路翎比较显著的精神创伤之一，它极有可能持续影响着路翎，直至 1994 年离世。在《监狱琐忆》中，已重新提笔十年，写下几百万字作品的路翎再次进入精神和思维的失常状态。这篇文章行文混乱，多处重复，路翎在文中多次强调“我不反革命”，并经由护士、劳动大队长等人之口，道出这样的话语“你不是反革命”“你是被冤枉的”，其中还写有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不太可能发生的情节，比如路翎的三个女儿在冤案发生时由民警带领，在街上宣传她们的爸爸“不反革命”。^① 朱珩青写在《监狱琐忆》“小引”中的判断，“由于特定的‘冤案情结’，使他不时地加入自己的某些想象”^②，应是准确的。

在胡风冤案的难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凭借来试着理解、接受、反思或蔑视横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据《胡风沉冤录》所载，胡风即使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还能凭借错乱的神经思索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问题，且能形成文字，记录下来。但路翎的情形不同，就目前能看到的材料观之，路翎在平反以前未有借助思维能力解构自身遭遇的印迹，也没能以自己常年依赖的文字能力来关注、突进外部世界的各种对象。在和强加的不公常年的詈骂声辩中，路翎作为地位极为悬殊的权力等级的下位者，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外部体制严整分明但非理性的逻辑世界中，在想不明白的混乱里试图为自己的清白做出辩解。尼采的提醒“与怪兽作战者，可得注意，不要由此也变成怪兽。若往一个深渊里张望许久，则深渊亦朝你的内部张望”^③，路翎完全未取。刑满释放后，他的真心、无辜和对生活的渴望依然缠绕在庞大的混乱中挣脱不出，在不可能明了的问题上徒劳地空转。^④

路翎的表现，在在不符合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受难者的想象，因对知识分子的一个期待就是他们可以别具精神能量，在任何时候实现相当程度的理性或心智的自我保全。尽管有学者把发狂的路翎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做类比^⑤，但路翎的表现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不是在疯狂里试着向内感知真相，如胡风做到的那样，在一种被迫害的恐怖幻境中观察并沿着混乱的、发狂的路径思索，发扬歇斯底里的敏感性，而更像无凭借的至弱者那样，把自己的身心交付给外部体制的混乱和不可解，抱冤喊冤，等待昭雪。比起个人英雄蒋纯祖（《财主底儿女们》）、李立人（《云雀》），写作重启时期的路翎更靠近“弱草”^⑥，即路翎笔下那些抱着抵牾心态与世界对峙，并以微弱之身与历史发生联系的，自毁的何德银（《屈辱》），暴戾的胡顺运（《预言》），绝望的王家老太婆（《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猪》），还有路翎塑造于 1942 年前后的“疯人”许小东（《卸煤台下》）。

二、路翎晚年创作的心理起点

《卸煤台下》取材于路翎在煤矿区工作时期遇到的真人真事。路翎曾尤其在意小说的末节，反复修改，将主人公许小东的结局由“不疯”改为“疯”，并因此达到了比较极致的艺术效果，因许小东的疯对周围人，尤其对帮助、鼓励又不得不遗弃了许小东的进步工人孙其银和唐述云来说，是残忍的，也是骇人的。

路翎写道：

一到厂区里喧嚣起来，劳动的合唱破空而起的时候，他就要失去他底平衡了；立刻明了了生活底绝望，落到无光的痴狂里去了。一遇到一个人，他就要战栗，像对方会抢去他的财宝，损坏他底正义似地，高声哭骂起来。^⑦

① 路翎：《监狱琐忆》，《新文学史料》2011 年第 3 期。

② 朱珩青：《小引》，路翎：《监狱琐忆》，《新文学史料》2011 年第 3 期。

③ 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19 页。

④ 据路翎的女儿徐绍羽口述，1964 年路翎保外就医回到芳草地的家中，“永远愁眉苦脸”，老是一句话“我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参见徐绍羽口述、黄美冰整理：《我的父亲母亲——徐绍羽口述历史》，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附卷，第 171 页。直至平反，路翎的精神状态稍好一些，纠结的问题依然是“是人民内部，还是敌我矛盾？”参见化铁：《重逢路翎》，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 117 页。

⑤ 王德威：《胡风与“胡适的风”：文学，自由，背叛》，《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 年，第 119 页。

⑥ 有关路翎所偏好书写的“弱草施暴”情节和笔下人物的抵牾心态，笔者曾有详论，参见郭冰鑫：《抵牾之人的重负——路翎小说中的“弱草”施暴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 年第 8 期。

⑦ 路翎：《卸煤台下》，《抗战文艺》第 9 卷第 5、6 期，1944 年 12 月。

路翎在回忆监狱生活时，写到与许小东相似的心境：“荒凉的痛楚的感觉中也想到，中国似乎在沉静地进展，于是更愤慨地呐喊与高声唱歌。（我想到，我也是爱国的人，却被认为反革命囚在这里。对于田野和远处的城镇、城市的人间的想象使我更愤慨地抗议，呐喊与高声唱歌。）”^①更准确一点说，这不只是相似的心境，而是经由残酷的政治强力，路翎来到与许小东同样的位置，即社会等级中的最底层，并且同样被排除在他们渴望的劳动世界以外，面对无以为生的绝境。

这样的绝境不独是路翎的，他的不少难友都有生活废弃、活在新社会最底层的表述。他们活在人世的身份不再是对他人进行启蒙、关怀的知识人、使命人，而是犯人、闲散劳动力、家里的负担和街面上的渺小者，随时面临生存难题，精神里普遍灌注着基于事实的自我轻贱——这正是新社会划分的新等级刺激出的日常理性。杜高在采访中谈到1969年被解除教养后，有十年时间“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②1955年至1978年，七月派诗人彭燕郊通过“心写”^③，默记自己被列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后遭隔离、坐监、劳改的心灵遭遇，集为一册《野史无文》。在这些“潜在”诗歌中，彭燕郊如实记录自我轻贱如何入脑入心，造成身心的耻辱和废弃感觉。刘志荣在研究彭燕郊的“潜在写作”作品时指出：“他清醒地感觉到自己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不再有容身之地，完全彻底地被抛弃到社会的最底层了。他也不再要求被荒谬的社会秩序所承认……”^④但路翎似无法放弃对承认的要求，他在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的情况下强求“正义”。新的等级秩序把路翎顷刻推入与熟习社会关系的隔绝状态，不仅远离了人民、集体，也远离了亲友，重要的是远离了长期在文艺实践上互通有无的胡风，无可抗拒地以等级之中最低位的身份，以福柯所谓“受规训的个人”^⑤状态进入与权力的亲密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路翎很可能已不是种种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具有主体意识的路翎，而是复杂的权力关系作用在他这样一个个人身上的一连串效果。彭燕郊在狱中所写《空白》一诗或能帮助理解精神失常的路翎也许同样体验过的“主体的消解”^⑥：

大空白还在扩大，跌进大消耗里的准生命已忘记来时的路，也忘记了应该有条去时的路，只是消耗，消耗，发出无内容的哭、笑和哭和笑的混声合唱……足以表明那永不省悟的一片痴心。人们叫它神经病。^⑦

与能写下骇人的主体消解过程的彭燕郊不同——这种书写即意味着主体消解在勇于认识和创作的彭燕郊身上的不可能——路翎的主体消解程度是较高的，他长期与不可解的深渊缠斗也注定会把深渊纳入身心内部。这意味着彭燕郊在多年后所批判的“50年代初形成的那个排队分类各就各位的机制”^⑧及其思维方式，能够通过等级更加森严的监狱灌入路翎的身心，缠绕着他过往的意识碎片，重塑他在1955—1981年底层位置上的社会关系。这也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阅读路翎回忆监狱生活、扫地生活的散文时，在其中强烈感觉到的是一个卑怯的言说主体，而非一个受难英雄。等级中的最低位者若想与整套秩序搏斗，需要经由主体的创造性力量实现抽离才可能保全理性，否则在持续、反复地呐喊“我不是反革命”的时候，就不得不进入审讯系统的荒诞逻辑来理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进入对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的无果辨析——这对1955年以后认识力量薄弱、地位卑微的路翎来说堪称精神上的无底洞。

在这四分之一世纪，路翎没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在强压下保留创作主体或认识主体这一最后的主体身份——他的漫长的抗议和对峙，既是对反革命指控的拒斥，也是对认识这一指控和认识自身悲剧的强力拒绝。这使得路翎在狱中的精神缠斗没有导向刘志荣所说的“自我主体性之下的战斗精神”，或“在绝望之中重新发现自己真实的主体性”^⑨。路翎没有回到他1930年代末文学起步的地方，而是沿着外部政治强力的逻辑，真正进入对集体、个人、自我全无凭依的自流状态，即前述许小东所在的卑微的、渺小的，且无法通过文学书写实现主体意识闪烁的位置。路翎也因此释放出此前生命中以光荣、勇气和各种价值伦理压抑下的

① 路翎：《喷水与喷烟》，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8卷，第263页。

② 李辉、杜高：《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书屋》2001年第4期。

③ 彭燕郊：《彭燕郊致陈思和、刘志荣》，《野史无文》，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④⑥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第170、171页。

⑤ 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54页。

⑦ 彭燕郊：《空白》，《野史无文》，第19页。

⑧ 彭燕郊：《我应该怎样想——一些原生态思想素材》，《野史无文》，第117页。

⑨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第146、178页。

全部恐惧，以及怯弱。这份怯弱没有任何卑污，只是一个有限的人和他所不能理解的某个巨大之物遭遇时，呈现出的自然状态，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遭遇不幸的梅诗金公爵所显现的那样。

在 1955 年以前的作品中，路翎对人的要求之高、不确信之深使他能残酷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进心灵的拷问场面，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底色中的基督爱不同的是，历史的重压和对革命者战斗人格的要求使得年轻的路翎一直抵抗着创作主体的精神暴露出软弱和恐惧的面向。这种抵抗因缺乏对复杂世界必要的畏惧并不自然，但并没有影响路翎通过自然的艺术禀赋冲破它所造成的障碍，使他能够表现并体认凡人的有限和无辜。1955 年 6 月被隔离审查以后，在反革命的指控下，自诩革命者的种种人格要求、德性要求都被剥夺并摧毁，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历史担负问题，还是启蒙问题，都不是一个身处“疯人”许小东位置的人需要关心的。而面对审讯室里荒谬的问答，监狱内外真实的压迫、侮辱和荒诞，不曾被路翎真正凭借的种种价值伦理之建构又怎能焕发生命能量帮助他维持心灵秩序？在漫长的二十多年中，路翎的桀骜和怯弱，恐惧和愤怒既没有胡风的理论加以支持和阐释，也不经由自己文字的过滤、变形和矫正。他的身心再不必由各种崇高的意义来清洗，而以付出巨大的精神代价和生命代价的痛切方式，化为一个颤颤巍巍的被解除了历史担负的灵魂——这个灵魂在一切被剥除以后竟还有力量，以怯弱渺小而非精神扩张的方式体验生的奇迹，这可能才是路翎平反后提笔写诗并写得那样动人的关键。

可以说，1981 年尝试写诗的路翎从鲁迅、胡风以及他自己所辟出的战斗精神道路偏出，真正进入了笔下“弱草”的人格世界。这里的人格并不如人们对路翎期盼的那样雄大，它表现为安宁，羞怯，和拙朴的歌颂，它追求明亮、美好，也不掩藏害怕和战栗，它会被某种价值伦理支配，也会反思从国家到个人的大大小小的成功和失败。在这个意义上，路翎经由自己的厄难实现了笔下世界之完成。无论是《卸煤台下》的“疯人”许小东，还是 1947 年剧本《云雀》中自杀的女主人公陈芝庆，过去均以其软弱、怯懦和慌乱被作者路翎呈现或判定为不属于历史道路的人物，被所谓更符合历史道路的先进人物痛心抛却。路翎所写《卸煤台下》最为骇人和揪心之处，正在于他写出了自负使者孙其银对孱弱人物许小东的遗弃。许小东这类面对巨变世界的哆哆嗦嗦的怯懦形象是近现代以来常常被作家和读者加以同情、批判后便抛却的，但路翎在 1940 年代初期没有放过这种唤起、帮助之后的残忍抛弃，并在 1981 年的写作重启中，从许小东，而非孙其银的心理感觉出发，在一个卑微渺小的位置上，试着重新理解一个值得敬畏的庞大世界，努力寻找其中“生命的法则”^①。

正如路翎不曾避开对许小东、陈芝庆等孱弱人物的观照，没有放过对孙其银遗弃许小东、李立人以历史之名试炼陈芝庆的展现一样，对路翎的理解也不应避开他的怯弱和战栗，避开他和权力的亲密接触而导致的心与信的溃破。也许路翎晚年诗歌所以动人的又一原因，正在于这个曾经搏斗得那样激烈的作家再没有离开疯人许小东的位置，这可能是因为受损精神承受力不足，也可能是基于二十多年厄难的生命经验做出的选择。他站在并且需要站在被历史必然性碾过的苍生的位置——是在这样的心理起点上，路翎尝试用诗歌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总的回答。

三、歌颂、静观与战栗

1981 年 7 月，路翎写下三首诗歌，10 月便在《诗刊》发表，此后路翎经由诗歌这种过去并未着力探索过的艺术形式，重启创作。纵览全新收录整理的《路翎全集》诗歌卷，1981—1982 年路翎共写下诗歌 94 首，接近晚年诗歌总量的半数，诗意图清新明亮，或宏大灿烂，大多内含着诗人对新时期生活真诚的歌颂。那么歌颂这一行为究竟为诗人紧张、受损的心灵带去了什么质地的生命能量呢？

“歌颂”是路翎晚年诗歌研究中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学者宋玉雯有意为路翎的颂歌一辩，称赞其对建设、现代化工业和时代生活的歌颂，但并未处理另一类歌颂作品，即宋论一带而过的“奉命文学”^②，亦即写有颂扬新时期政治政策和领导人句子的作品，如《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律动》《阳光灿烂》《陆军军官》《都市的精灵》等等。这些普遍为论者难以消化的政治颂歌尽管在艺术上不算成功，但在理解和勾勒路翎整体意识变迁

① 路翎：《在阳台上·丧失者》，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 10 卷，第 486 页。

② 宋玉雯：《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79 页。

方面不容忽视。这些诗歌并不缺乏真诚，也非主体性缺失或因精神创伤作伪的作品，因路翎的歌颂并非有意迎合，而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新时期何以“阳光灿烂”的答案之一，探索并书写下来的。

路翎常在诗歌中使用连行的“因为”来带动表达和思考，他的多首诗作中都有“因为”句式参与的自我问答。在1981年10月所作诗歌《阳光灿烂》中，路翎以数个“因为”为句子的开启，经由受损的神经展开对时代何以光辉的初步探索：

因为剧场里
孙毓琴、赵燕侠唱着《玉堂春》——
中国旧时代的凄凉故事的缘故，
因为这对比，
中国现时代的灿烂便特别雄伟；
因为这社会主义灿烂光明也有着它的
浮沉、动荡、奋斗，
因为这便继续着烽火高举：江流澎湃
都市绵延和田亩亿万亩绵延、工厂林立，
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
因为街头行走着邓小平和陈云……
走于亮光中又行走于阴影中，
黄鹂鸟在空际高声歌唱。^①

《玉堂春》是著名的京剧剧目，讲的是苏三含冤的故事。路翎由这样一出京剧起笔，说明他不是站在反思和批判的高位来看待新时期及其政党表现的。路翎写这首诗时的自我认知，依然是社会等级中的卑微者和曾经的鸣冤者，这让路翎切实体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拨乱反正工作带来的拯救感觉。绿原重视路翎对“邓小平、陈云走在大街上”这一庄严场面的描写，似有感同身受之感：“和一切冤假错案的当事人一样，路翎真正复活而为人，是从伟大的‘三中全会’（人人都知道，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路翎能够活到今天，躬逢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目击中青年作家有一切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积累自己的成果，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会和我们大家同样感到幸福的。”^②

“感到幸福”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路翎的情形。1955年以前，路翎无论如何调整认识，变化情感，仍会像蒋纯祖一样本能地怀疑外部拯救，但两次平反后，他能把自己放到被拯救者的位置上，真切体验到“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便足以见得路翎内在倾覆之巨。这种巨变如不以相当的冷静甚至麻木、冷漠来“静观”，是会让人再次崩毁的。

“静观”曾经是路翎尤其反对的美学立场，他主张“在新的美学立场上，不是距离（虽然有时人们借用这个不妥的说法），而是战斗和实践”。^③但路翎在写作重启时期的诗歌中呈现的美学立场不是“战斗和实践”，更倾向于有距离的“静观”。路翎在诗歌中“静观”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创作主体的身份认知经历着仍未完全静止下来的巨变——由一个自信扩张的历史道路担当者过渡为一个被历史碾过的羞怯的底层之人。这种巨变不能不潜在地包蕴路翎对不可理解的内部巨变调动的强大克制，这样一种意志上的克制可能深入路翎的潜意识，和过去路翎创作上的精神搏斗有着近乎同等的力量。也许这便是路翎晚年诗歌尽管有一种静态的平淡，但依然动人的重要原因。

以这种克制的“静观”为基本的美学姿势，路翎在1981—1982年的诗作里安静、从容且通常是有秩序地排布他的所见和想象中的所见，比如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律动》中，诗人通过“和”“的”对名词和形容词的长长连缀，仿佛目光绵延能将城乡边缘的一切尽收眼底。“静观”使得路翎能够通过眼睛和笔力重建内心秩序。再转回《阳光灿烂》一诗，或能更客观地看待路翎对“中国现时代的灿烂”之原因的耐心追踪。

① 路翎：《阳光灿烂》，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7页。

② 绿原：《路翎这个名字》，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93页。

③ 冰菱（路翎）：《谈朱光潜底“距离的美学”——文艺杂谈之二》，《展望》第3卷第10期，1949年。

“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这样的歌颂，不是作为空洞的口号，而是作为路翎抵达问题答案的一个收入眼底的路径，进入了他的诗。在疗愈自身方面，这种切切实实的目之所及和引发的想象所带来的效果——这里面不能排除路翎对共产党新时期政策变化的直观感受——都胜过了对自身苦难的追击。不过需强调，路翎写作重启时期的“静观”建立在诗人表现为冷漠、迟钝或麻木的巨大克制当中。在亲访路翎的友人里，化铁是为数不多相信路翎未毁的人。他认为路翎的冷漠“不是崩溃颓唐，这冷漠是对人生的重新思索，是对世界的再认识；是对哲学的批判，是对是非的固执”，“那冷漠后面，有一颗坚定清醒的心”。^①

在路翎复出初期的诗歌中，《杏枝歇鸟》一诗足以证明化铁的判断。这首诗写于 1982 年，整理于 1984 年，因其难以阐明的内涵值得专门讨论。“杏枝歇鸟”指的是一种可用于售卖的手工艺糖果。全诗在宁静的殷实感中展开，诗人有意将立于杏林枝头的黄鹂鸟与“杏枝歇鸟”勾连，黄鹂鸟认出种黄豆的老农民正是做糖鸟的手艺人，“便觉得自己很美丽”，它观察老人的播种和他在田间与年轻人的“经济学的辩论”，看到生活场面的富足和安宁，这时黄鹂鸟升起一个揣想：

黄鹂鸟啼唱，确认黄豆种植者农民老头上月曾做了 20 个“枝头歇鸟”，并揣想自己是从那些里面飞出来的。……^②

黄鹂鸟的揣想写出了这首诗的要意。宋玉雯认为这个揣想是“没有理由的”，进而略过对“理由”的探析，将诗意凝结在“真实与再现”的颠倒，“原来糖制黄鹂鸟才是‘真身’，而现实世界里的黄鹂鸟是它的拷贝副本，甚至，人们的耕读世界，那一派祥和闲适的牧野风光，是由这只糖制黄鹂鸟的幻想构筑而成”。^③ 宋论似乎过于急切地将路翎过去作品中对“幻想”的调用应用在了对这首诗的解读上。诗人追问的是哲思的，也是现实的，即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一种鲜活殷实的生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一个曾热切参与历史，又错失二十多年宝贵工作时间的人来说，突然看到世界的变迁和建设生活的如火如荼，无异于将自己曾渴望过的奋斗目标，那种一切革命者盼望的美好生活的终极历史图景忽然拉至眼前。路翎急切盼望获取知识和讯息，以了解这种生活的由来。经由黄鹂鸟的揣想，同时也是路翎自设的问答，他在经济知识普及的新鲜里获得了一种认识：黄鹂鸟的快乐的存在及其所见之一切殷实，是从一个老农民的经济行为里产生的，这也应和着老农民在田间与年轻人的辩论，“论的是‘价值与价格同一’和‘价值与劳动者的劳动等值’等高深的名词”^④。路翎尽管精神受损但依然直觉精准地把握住改革开放时代起步期的核心动力，即经济的勃兴和发展，它具体地穿插在农民、年轻人、少年和鱼塘少女的生活、学习和生产当中，并且让寻求自身来自哪里的黄鹂鸟（黄鹂鸟也指代了晚年路翎），暂时获得一种“从哪里来”这类大哉问式的思索落在实处的安慰。

由此，《杏枝歇鸟》这一面向外部世界的思与识，经历小小的艺术演绎获得了一点成功，这对路翎过于紧绷且曾绷断废弛的神经应该说是不小的鼓励。1982 年 3 月，在写下《杏枝歇鸟》初稿不久，路翎尝试写作一首篇幅较长的叙事诗《野鸭湖》。在开篇第二节，路翎写下一个缺失标点符号的长段，似仍在排布目之所及：

和杨树闪亮着树叶在春风里摇晃和高大的松柏枝干摇动空中爬着的蜜蜂和开着白色芬芳的花的槐树和长出嫩的枝叶开始结果的李树和红色的花瓣堕落结出果子的桃树和……^⑤

但这次的排布没有有序且安静的感觉。它的出现不是为缓缓展开诗人眼里静躺的野鸭湖，而是通过缺少停顿的语言急流，体现新的时代各样生物的生命动作何其热闹和拥挤，以强烈对比的方式，刺戟“并没有什么出来”^⑥ 的湖水翻涌出湖底那些属于旧时候劳动者的苦难史。路翎经此调回更多的历史经验和内在的创作经验。1983 年，路翎并未进行诗歌写作，1984 年以后他开始比较多地写作散文和小说作品，诗歌创作也进入更为复杂的思索层面。“静观”的克制渐渐松弛，路翎尽力以有限的思考能力，将身心投入时代之变化及其惊奇。在大量展现新旧时代巨大差异的诗句后面，是诗人愈加凸显的渴望认知的强大动能，这使得他的诗充满思的活力。路翎是在感受新时期之热烈、美好的过程中，越发回忆起旧时候的混乱和苦痛，惊奇于新旧时

^① 化铁：《重逢路翎》，张业松编：《路翎印象》，第 120、122 页。

^{②④} 路翎：《杏枝歇鸟》，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 10 卷，第 142—143 页。

^③ 宋玉雯：《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第 283 页。

^{⑤⑥} 路翎：《野鸭湖》，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 10 卷，第 152、153 页。

代之间那看上去无法跨越的距离，竟这样就跨了过去，如他自己在诗中所问“洁净的大地怎样似乎从空中降落，掩埋了多年暴乱的地狱”^①。他反复书写新的“新异”和旧的“阴影”，正是希望能由这对照找出“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②——在他没有以智力和劳力参与的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国家和人间生活”^③究竟是怎样走到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今天的？

在路翎晚年重要的长诗《旅行者》中，旅行者道出了感觉上的“突然”：“人们奇迹似地焕发，地狱的灾难便过去了”，“时代展开，建设突然灿烂”。^④如何解释这种“突然”的“奇迹”呢？对思维和精神承受力已稍有恢复的路翎来说，这样的“奇迹”不像刚平反时那样，作为一种事实就能简单接受下来——不问因果的接受让路翎惊惶不安。“颤栗”“战栗”“惊悸”“惊惶”“颤抖”经常出现在路翎晚年的诗歌中，尤其频繁地出现在1990年写作的诗歌里，直到他不再写诗。无论这些“战栗”是出于对过去的恐怖反应，还是出于新时期感受到的欢乐激动，路翎由心到身都在强烈地与外部世界发生感应，这种感应的颤动如此频仍，正说明了诗人的无法自持。在1987年发表的《月亮停留在屋脊上》一诗中，路翎为安抚他的震颤，开始追问“意义”。

被灯光装饰的大街是什么意义
巨大的机动车和车后的红黄灯
街头的灿烂的橱窗，是什么意义
月光停留在房脊上
这一切有它的意义^⑤

路翎在这首诗中似确认了意义的存在及其深刻性，但并未探查到这意义是什么。对意义的追问往往是徒劳，尤其对刚刚经历过意义透支、混乱和废弛的路翎来说。1987年11月，路翎再度写下探讨意义的诗歌《太阳照耀在屋脊上》。在“太阳照耀在屋脊上/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的后面，他没有留下空白，而是用另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来做出回答^⑥，把对意义的无底洞似的追问转换为对时间中变化发展的事实坚定的认识需求。路翎此时已渐渐走出了刚获平反时怯弱的心理认知状态，他在诗行之间越来越要求一个清晰有力的、自信的认识主体。

四、前进年华的秘密和路翎的认识变迁

在发表于1988年的作品《白昼》和《夜》中，路翎渴望实现新的“认识”，他写“白昼的现行的时间镇静/它逝去和结出果实产生认识”^⑦，又写“屋檐和矜持的树木/都达到沉静的逻辑/人间生活的 理性的认识”^⑧。在《旅行者》中，旅行者的身份被路翎标明为“智识者”，他追问“他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有什么意义”^⑨，并在追问的过程中，展现出化铁所敏锐感知到的“坚定清醒”。

我的意识是我的心脏越过炼狱时的凶狠的冷静的火焰，
我便前行，
我思维，想象，有辨析的逻辑——我们是巨大的存在。^⑩

这种经由自己之思，而非经由外部确认的“巨大的存在”感使路翎至少在写诗的时间里感到一种久违的强力，并发现自己有一颗“内核是极强的火焰的、血液盈满的心脏”^⑪。“心脏”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路翎晚年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探讨得比较充分，在此不赘，此处比较关注的是路翎对这颗心脏的“实体”做出的阐释：

这样的心有其实体，
实体是人类历史和祖国历史的动力，
晶莹的深草丛中的泉水

①③⑨⑩⑪ 路翎：《旅行者》，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49、435、433、443、444页。

② 路翎：《听一曲歌唱起来》，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369页。

④ 路翎：《旅行者》，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42、444页。

⑤ 路翎：《月亮停留在屋脊上》，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387页。

⑥ 路翎：《太阳照耀在屋脊上》，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05页。

⑦ 路翎：《白昼》，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52页。

⑧ 路翎：《夜》，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53页。

沉睡几千年也会醒来的地核里的渴望力，
……
实体是在你的心脏里有大城、市镇、田野和人造星球，
实体是现代的辩证逻辑，
实体是，从地核到低空，
有一个带电的、有创造力的正直的空间。^①

路翎对这样的实体，也就是能维持心脏持续跳动的稳固能量做了多个向度的探索，显示出有别于过去的认识需求。他需要的已不只是心脏勃发的主观战斗精神，不是昂扬的但是充满动摇感觉的主体性——这对经历历史患难而参不透历史理性迷障的路翎来说已经不够，他需要认识的是支撑强有力心脏的实体内容，它的首要组成是历史的“动力”，即“地核里的渴望力”。在《图书馆女馆员》一诗中，诗人在“百科全书”“苏联的大辞典”“古典的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看到了“历史的行进的规则”，更看到了“自然运转的规律”，体验到“这里面有自然的巨大与人间的对宇宙、社会的奋斗的思维/的巨大与/如同多一层亲切的空间一样的灿烂”。^② 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由历史暴力造成的持续“精神受挫”^③，路翎把“自然运转的规律”“自然的巨大”放至与“历史的行进的规则”“思维的巨大”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旅行者因此有了全新的认识：“自古有种植者，人类从自然规律完成英雄事业。”^④

至此，诗人心里的英雄似已从革命者转换为自古的种植者，他们完成英雄事业的方式不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召唤下担负历史，而是遵从自然。但于路翎而言“自然”是什么呢？在路翎为历史摆荡的人生中，什么样的自然规律可以用来理解自身，来安抚他种种新的、旧的战栗呢？路翎恐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知到“过去时代和新时代综合的炼狱”^⑤。与新时期各就各位投入建设和汇入各种潮流的人相比，路翎无论是在剧协的工作方面^⑥还是在个人的创作上都惶恐无措。他以克制和静观写下的目之所及的向上、灿烂，在在提醒着他，人们都能“走向他们的位置”^⑦，而他却无法找到自己的。“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这个追问的真正内涵不是做时代前进之秘密的真理性探索，而是路翎找不到自己和这个秘密的相关性。当旅行者感受到“灿烂的阳光和宁静的夜，中国和世界的工作成绩，是整体的认识”^⑧，诗人很可能是在这种理应感到安慰和安宁的认识中，战栗于一个无望的答案：他和这内容丰富的工作成绩，可能没有关系。

在回忆监狱生活的诗歌《拉车行》中，路翎塑造了一个犯知识罪的中年教师，试着建立监牢犯和中国现代化的联系，可以看作是路翎的自况：

他还要有为，建设中国的现代化；
将来他这样想：中国的现代化的车
有的是从监牢里出来的囚徒拉的。^⑨

这样的自况能带来多少实际安慰呢？从路翎平反后的实际状况来看，他和中国现代化的联结缺乏自身的实感支撑，敏感、认真且赤诚的路翎不太可能通过类似“逝去的年华在出狱时有它的意义”^⑩ 的安慰来抵达内心平静，他如实写下：“我因欠时间的债而心跳恐怖，我因劳动力被迫丧失/或无人来雇佣而痛苦战栗。”^⑪

路翎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和时代前进之间的联系呢？1990年3月，路翎进入了人生最后一个诗歌爆发期，这次他取道失败和丧失，而不是执着于联结和意义，终于寻到嵌入建设时代的方式，并在实现嵌入以后，收获了心境的平稳，离开了诗歌写作。3月10日，路翎写下一首《丧失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大地在冬季总是要回到春季，

①④⑤⑧⑪ 路翎：《旅行者》，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44—445、446、439、446、439页。

② 路翎：《在阳台上·图书馆女馆员》，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68页。

③ “精神受挫”出自路翎帮助参写的年谱，“受挫”可能是路翎更为认可的对自身精神状态的描述，参见张以英编注：《路翎年谱简编》，《路翎书信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245页。

⑥ 贾植芳曾回忆路翎在剧协惶惑以致长啸的工作状态，参见挺生：《夜里飘流而踌躇的魂魄》，《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⑦ 路翎：《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律动》，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22页。

⑨ 路翎：《拉车行》，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322页。

⑩ 路翎：《葡萄》，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336页。

而丧失了的死者不能再归来^①

《丧失者》是比较贴近路翎晚年心灵实景而尤为灰暗的作品。尽管丧失者依然在寻找一个“热力的，生命的法则”来弥补丧失，但诗人已经开始直面自己丧失的部分不可能像四季循环那样再度“归来”，自然的规律宣告的是生的不息和死的事实。在诗的后半段，丧失者感到自己“走过的不是街道，而是赤裸的大地似的；在赤裸的宇宙里，到来阳台上，痛苦，战栗，想着生命的法则。”^②这一法则因为不只涵容了生的热力，也包括了死的确认，而让诗人能够无阻碍地体会到大地、宇宙朝向一个渺小有限的生命有其赤裸和坦诚。在写于《丧失者》五天前的作品《落雪》中，路翎直面了纯白的雪、时代的灿烂对平原的“覆盖”。这样的“覆盖”与“洁净的大地”对地狱的“掩埋”不同，诗人发现从天而降的洁净最终化作积雪，长久“蓄存”着平凡者的死生，“浓烟中急促、沉重、死亡、胜利、勇敢、激昂的/动作，在各年的雪里沉默地蓄存；它将长蓄存”。^③于是在这首诗的最后，路翎写出了至为温柔之句：

落下来的雪是思念的烟与火变化的，
人们心中有很多的，
思念的烟与火；
落下来的雪是内心的揉搓的云，
人们心中揉搓着感情的云。^④

死者，对死者的思念，人与自然界的雪、烟、火，还有云，至此就凝在了一处，化为能够沟通可知和不可知，可解和不可解的世界的感情，这感情柔软、包容、有力。在晚年尤其是1990年的诗歌中，路翎频繁写及泥土、大地、宇宙、星空这样宏阔的语汇，并创作出《宇宙》和《泥土》两篇直接展现“天体与泥土亲密”^⑤的大和谐作品。张业松认为《宇宙》《泥土》有着“明显的诗情哀歌迹象”。^⑥比起同期写下的《蜜蜂》《蜻蜓》《狐狸》等内涵更为复杂的诗作，这种“哀歌”似是确实的，但“哀歌”也许并不是诗艺方面的问题，而是路翎心中的惶惑，即自己能以何种方式嵌入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这一难题终于得到了让他感到安慰的解答。《泥土》这样写道：

——树木在喝着
泥土中的新的液汁了。
这是由于
地球整个的
泥土，
由于人类的
斗争，
而形成
比以前强韧的
魂魄，
和
由于
……
从春的
灿烂，
一直到
冬的
纯洁，

^{①②} 路翎：《在阳台上·丧失者》，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86、487页。

^{③④} 路翎：《落雪》，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492、492—493页。

^⑤ 路翎：《泥土》，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527页。

^⑥ 张业松：《编者附记》，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10卷，第501页。

增加了
它的巨大的
魂魄的力量，
与每一颗
颗粒里的
精灵的光芒。^①

这便是诗人对新的时代何以充满生机，又何以灿烂做出的回答。路翎看到“人们继承着，勤苦于泥土上的祖先，的/衣和钵所产生的力量”^②，也看到斗争过的自己将列入祖先而使民族形成“比以前强韧的魂魄”的可能——这一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化作泥土滋养生灵的思维进路，却经历路翎近十年的诗歌摸索。一个严肃且因其严肃而受到伤害的自负使命者，终于能够在恒常无限的宇宙和泥土里找到一个渺小的、并无特异的生命落点。路翎写道：“失败者失败于他的事业，——这失败者从事着他心爱的事业，两边的路似乎是人间的其他的路了，从这其他的路走去，走进心中的陌生的街。”^③ 经由自己的无路，也即“小我”的失败，诗人看到“人间的其他的路”。路翎由此体认到，也许他个人的失败于“前进的年华”并不重要，而确认了生活、历史、天地之“伟”和自己之“小”。这种“小”让他化入曾力图书写的史诗的时代而不再计较一己之道路是否留下痕迹。如此平静的消隐和列入祖先的实感，使路翎获得了真正的安慰。一个自负使命的、多少有些刚愎的艺术劳动者走到生命的晚期，终于得见自身将以何种形式“完成”。

宋玉雯认为路翎晚年作品“存在着一种磊磊的尊严感”。^④ 尊严感可能来自路翎面对厄难的方式，他从扩张的自我里被动或主动地走出后，并未让天地都随之变小，而是敬畏天地之大，万物法则之莫测。“路翎”不重要，这大概是诗人最后收获到的真理。而无论重不重要，路翎都已成为这片土地的祖先之一。路翎最终把自己隐微地置于前进年华的秘密当中，既证得自身，也证得这个民族的前进。

(责任编辑：张 瑞)

“What Secrets Lie within the Advancing Years”

—— The 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Lu Ling's Later Creations and His Epistemic Poetry

GUO Bingxin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otential writing of the Qiyue School (“七月派”), Lu Ling who was in mental sickness ceased 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his prison life. This phenomenon deserves in-depth research to clarify the crucial spiritual composition of Lu Ling's later creations, especially his poetry. In the poems, there is not only the undestroyed “heart”, but also a timid and trembling speaking subject that needs to be confronted. When Lu Ling restarted his writing, his mental state was similar to the “weak grass” in the sequence of his fictional characters, especially the character Xu Xiaodong in *Under the Coal Unloading Platform*. Starting from this point, Lu Ling was motivated to write poems by the pursuit of “what secrets lie within the advancing years”. With a strong epistemic impetus, he went through phases of bright eulogy, restrained contemplation, in-depth inner explora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self. Lu Ling experienced the miracle of life and the fact of death through timidity and insignificance rather than spiritual expansion. Through his epistemic poetry, Lu Ling wrote about his contemplation on whether and in what way he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 After finding the final answer, Lu Ling stopped writing poetry.

Key words: Lu Ling, later poems, potential writing, Qiyue School

①② 路翎：《泥土》，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 10 卷，第 532—533、529 页。

③ 路翎：《失败者》，张业松主编：《路翎全集》第 10 卷，第 499 页。

④ 宋玉雯：《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第 314 页。